

尚德敬业求真 启思导创育人

——记我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

○ 韩延明

〔内容提要〕 本文从“高度的热情、高尚的品格、高深的学问、高明的教法和高超的口才”五个方面对我国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潘懋元先生的德、识、才、学、能进行了全方位的评述。

〔关键词〕 追求 美德 治学 启导 逻辑

〔作者简介〕 韩延明,厦门大学高教所高级访问学者,曲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院长、教授 邮编:273165

忝列厦门大学高教所后我发现,无论是教职员还是研究生均习惯于尊称潘懋元教授为先生。但“先生”二字在此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称谓和客套,而是包含了大家发自肺腑的由衷的敬爱之情。通过多方面的耳濡目染,使我对潘先生学识与品格的了解也由浅入深,心目中的“先生”形象亦愈益明晰。潘先生的德、识、才、学、能均达到了令人向往的高层次境界,学生无力“囊括大典”,只能择其“沧海一粟”略作浅述。对此,我简要概括为“五高”,即高度的热情、高尚的品格、高深的学问、高明的教法和高超的口才。

(一)高度的热情,执着的追求

古人云:“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寓于海”。白居易在其长诗《琵琶行》中也写道“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做好一件事情,干出一番事业,首先必须对此满腔热情、执着追求。纵观华夏春秋,那些名垂青史的教育家们无一不有多年锲而不舍杏坛执教的育才生涯:孔子执教40余年,孟子执教50余年,董仲舒执教30余年,朱熹执教50余年。而潘先生,自15岁那年初任小学教师并萌生了立志从教的理想以来,边教边学,边学边教,“痴心不改”,迄今已先后在小学、中学、大学“诲人不倦、驻足讲坛”长达63年!“匪面命之,言提其耳”,“滴滴汗水诚滋桃李芳天

下,点点心血勤育英才泽神州”,一以贯之,不懈追求,几十年如一日地“自我努力,自甘寂寞,自讨苦吃”(潘先生语)。63年,22990多个日日夜夜,这需要多么强大的毅力和心志!这又是何等强烈的事业心、责任感和使命感!记得孟子曾谈到“君子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忤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对这“第三乐”,朱熹注曰:“尽得一世明睿之才,而以所乐乎己,教而养之,则斯道之传,得之者众,而天下后世,将无不被其泽也,圣人之心,所愿欲者,莫大于此”。对此,潘先生也始终是“志于斯、思于斯、忧于斯、劳于斯、乐于斯”。他曾满怀深情地说过:“我的理想就是当教师,当一个好老师”^①。“我一生最为欣慰的是,我的名字排在教师的行列里”^②。是的,人生中最能引人奋发的是事业。不同的人生理念演绎着不同的生活轨迹;不同的思维方式塑造了不同的社会角色。人生价值决不仅仅在于单纯的生命延续,而主要在于在自己热爱的事业中有所作为、有所奉献。至1998年6月,以潘先生为核心的厦大高教所已培养了上百名博士和硕士,其中许多人已经成为国内高等教育理论界十分活跃的中坚力量。

《诗经》上讲:“其命维新”;《易经》上说:“日

新之谓之盛德”。潘先生的高度热情和执着追求，还表现在他耿介拔俗、励精图治、敢于开拓、勇于革新并与诸多同仁协作攻关的“创业精神”上。是他，第一个呼吁在我国开展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并创建了全国第一个专门的高等教育研究机构(1978)；是他，第一个倡导在我国建立高等教育学科并主编了全国第一部《高等教育学》(1984)；是他，使厦大高教所在全国第一个被评为高等教育学硕士点(1982)、博士点(1986)和全国唯一的高等教育学重点学科(1988)，1997年6月，又被正式列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项目。事业的发展如此之快、如此之好，若没有一个知难而进的开拓精神，是绝然不行的。正如潘先生所言：“我认为，干一件事乃至树立人生理想，不光靠兴趣，还靠一股‘我偏要’的狠劲儿，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牛劲儿，就是‘知难而进’的进取精神”^③。正是由于潘先生这种“知难而进”、“敢为天下先”的创业精神，使厦大高教所“挺然特出，褒然独立”，“学风丕振，事业勃兴”，在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方面“遥遥领先”：组织召开了第一届全国高教研究所(室)工作研讨会(1989)、台湾高等教育研讨会(1991)、第一届全国比较高等教育研讨会(1992)、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研讨会(1992)、高等教育学科研究生培养工作研讨会(1992)、第一届全国高等教育史学术研讨会(1994)、亚太地区私立高等教育国际研讨会(1995)、中美高等教育财政问题研讨会(1996)等。

诸葛亮说过：“志当存高远”；《易经》上也写道：“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潘先生的高度热情和执着追求也体现在他高瞻远瞩、面向未来的发展预测与规划上。众所周知，邓小平同志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曾为中国新时期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潘先生作为厦大高教所的创办者和设计师，也为该所规划了从1978年至2000年长达22年的三个战略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978—1983)，以建立高等教育学新学科为基本任务，促进建所工作；第二阶段(1984—1990或稍后)，以培养人才为主要任务，并围绕培养人才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第三阶段(1990—2000)，进行较高水平与较广泛领域

的科学研究，加强国际教育学术交流，建成名副其实的国家重点学科点。这些在当时具有超前性、预测性、发展性的规划目标，除第三阶段尚有部分项目正在进行外，如今基本上已全部按期圆满完成，充分体现了潘先生高度的事业心、责任感和远见卓识。

(二)高尚的品格，谦虚的美德

朱熹曰：“善为师者，既美其道，又慎其行”；《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教师的根本是教书育人。但“经师易获，人师难得”，所以潘先生指出：“对于社会科学来说，导师对博士生的指导，专业的具体帮助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方向上的指引、方法上的点拨以及人格上的影响”^④。这种“人格上的影响”便是教育者的言传身教、为人师表。潘先生在这方面堪称楷模。他，以身立教、克尽职守：有次因台风影响，厦门大雨滂沱，为了不耽误给学生上课，这位78岁的老人赤脚趟水步履蹒跚地走到高教所，笔者至今犹历历在目；他，事业为重、以所为家：1994年4月，潘先生被聘任为香港巨富李嘉诚投资兴办的汕头大学教授，月薪6000元人民币，而潘先生仅拿1000元作为自己简朴的生活开支和房租，剩余5000元全部捐献给厦大高教所，用以补充严重缺乏的科研经费；他，气量恢宏、提携后生：除对自己的弟子“耳提面命”、促其成才外，潘先生时常收到一些素不相识的青年写来的求教信，不管是请教学术问题，还是询问考研事宜，他都尽量亲自回信或让研究生秘书代笔复信，有时还自己花钱为他们寄书或资料，每次收到请求审阅的论文，他总是细心批阅，或提出修改建议，或推荐报刊发表；他，博采众长、从谏如流：凡是有利于学校建设的、有助于学术发展的、有益于人才培养的意见或建议，不管是谁提的，他都能虚心听取、积极采纳，并尽快付诸实施；他，心胸坦荡、虚怀若谷：每逢硕士生或博士生入学，潘先生的第一次报告，总要提韩愈《师说》中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一段，倡导“教学相长”，主张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鼓励学生在学术问题上展开论争以明辨是非、激活思维，允许学生有与导师不同的学术观

点,他明确表态:“对于博士生的学术观点与学术见解,只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不一定要强求与导师一致,以免压抑他们的创新精神”³⁾;他,和蔼可亲、与生同乐;来厦大后,周六晚研究生在潘先生温馨整洁的书房内或客厅里“挤挤”一堂所进行的“周末沙龙”(潘先生称之为“家庭访谈制”),令我耳目一新、深有感触。据说这一活动已坚持了多年。每次潘先生总是事先准备好果品、糖块、茶水、咖啡,大家沙发一坐,一面“各取所需”,一面“话说天下大势”;闲聊“学术、见闻、生活”,神侃“改革、开放、外国”,各抒己见,纵横捭阖。有时潘先生出题目,大家作“文章”。我看颇有点像《论语》的《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中所描绘的孔子与弟子“各言尔志”的情境。此时,潘先生总是作为一位宽厚的长者,作为平等的一员,认真倾听,偶尔含笑点悟,时而择要短评,或者启发诱导,以其洋溢着人生智慧而通俗易懂的话语指点迷津,亲切而自然。

潘先生不仅自己敦品立德、率先垂范,而且很重视对学生的“做人”教育,要求学生欲作学问,先学做人。他严肃指出:“一个缺乏事业心的人,是难以担当科学事业的开拓重任的;一个责任感不强、敷衍草率的人,是难以树立带头人应有的威信的;一个科学态度不严肃、治学不严谨的人,是难以攀登科学高峰的”⁴⁾。他对学生的政治表现、学习态度、道德修养、为人处世乃至生活小节都非常关注,并及时地给以点拨、引导和教育。若有过失,他定会严肃地甚至严厉地予以批评。就这点而言,学生们又都很怕他。正如《论语》所言:“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三)高深的学问,严谨的治学

古人云:“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孟子也说过:“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广博的基础知识、深厚的专业知识,是见解深刻的基石,是思虑周密的源泉,是治学成功的关键。潘先生认为:“一个现代化专门人才”的合理的“知识结构”,应包括“比较宽厚的基础知识”、“一定深度的专门知识”、“一般的前沿知识”、“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和科学方法论知识”及“一般基本文化知识”五个方面⁵⁾。他本人知

识面很广,不仅对教育理论造诣精深,而且对哲学、经济学、逻辑学、文学等学科亦有多年涉及。其讲学足迹不仅几乎遍布中国各大省市,而且还先后到日本、泰国、尼泊尔、科威特、英国、美国、俄罗斯、菲律宾、新加坡等国和香港、台湾地区访问考察,搭建了中国高教研究与世界交流的桥梁。鉴于其所做的突出贡献,他已相继被一些大学或研究机构聘为兼职教授、研究员,并被英国赫尔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学位。

记得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在其《回忆马克思》一书中曾这样写道:马克思的头脑是用多得令人难以相信的历史及自然科学的事实和哲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因而他的头脑就像在军港里升火待发的一艘军舰,准备一接到通知,就驶向任何思想的海洋。我们说,正是由于马克思知识渊博、思维敏捷,才使他智慧如注、灵感迸发,得心应手地遨游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学海之中。同样,也正是由于潘先生深厚广博的教育学、经济学、历史学、哲学、心理学、逻辑学和文学功底,才使他睿智过人、眼光犀利、文思泉涌,再加上他“板凳甘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治学态度,始得以成果累累、业绩卓著。不仅在高等教育学科理论建设方面有精深研究并独树一帜,而且在比较高等教育、高校教学与课程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高等教育史、民办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地方化、海外华文教育、教育未来学、现代教育与教育现代化等研究领域也有精辟见解。

潘先生勤于学习、善于学习,很注意不断吸收新的学术信息,很重视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熟悉的人都说他人老但不守旧、不封闭、不自满、不迟钝。他虽已耄耋之年仍孜孜不倦。笔者曾留心观察到,潘先生无论外出参加学术会议,还是本所举办学术讲座,抑或学生进行专题讨论,甚至所里组织政治学习,他总是随身携带笔和笔记本,认真地听讲,不停地记录。遇到关键性或疑惑性的问题,还会当场提问。那谦诚,那神态,俨然一个“小学生”。确如《论语》所说:“敏而好学,不耻下问”。

潘先生治学严谨,论著严密。撰文时很注重

遣词造句的准确性、适度性,很讲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记得唐代诗人卢延让曾自述其诗作是“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潘先生何以不是如此呢?比如他在撰写《关于民办高等教育体制的探讨》一文时,为了引用清末私立大学“无庸立案”一说,还专门花了不少时间去核查有关史料。但笔者在拜读该文时发现,实际上写在论文中的只有一句话:“光绪二十三年,有的私立大学申请立案,清政府竟以无此规章,着令‘无庸立案’,听之任之”^⑧。为了一句话,核查了几小时,其治学之严谨,由此可窥一斑。潘先生对学生要求同样十分严格。凡遇到学生论文写得太草率、抄写太潦草,他都会毫不客气地退回令其重写、修改或重抄后再去送审,就连标点符号也不放过。

潘先生的高深学问和严谨治学,还表现在他远见卓识的超前性思维上。他总是站在高等教育学科的前沿和制高点上高屋建瓴,善于把握时机,具有很强的学术敏感性、时代洞察力和理论勇气。有些如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民办高等教育、中心城市办大学、市场经济与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与高等教育、知识与高等教育等新课题的研究,往往都是在微露端倪甚至未露端倪时就被潘先生“看”或“抓”了出来并率先进行探索。特别是在关键时刻对学术研讨站得高、看得远、抓得准。如潘先生任理事长的全国高等教育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已召开了四届学术研讨会。在前三届学术研讨中,为了巩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地位,完善高等教育学的学科体系,潘先生便引导大家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概念体系、逻辑起点、学科结构、研究方法等展开讨论和争鸣,而且每届研讨会都有一个主题,研讨集中,成效显著。但到了第四届研讨会(1997)时,潘先生则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我们老是只围绕一个方面,即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讨论下去,固步自封,而不去接触火热的高等教育实践,就会由于钻牛角尖走到死胡同”^⑨。因此,他与有关同志商议后,果断地进行了“主题转换”,确定为“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如何更好地为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实践服务”,并首次提出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中介环节”说,引起了与会人员的共鸣,

也引导了一个好的学风。确实是有识之“师”。

(四)高明的教法,有效的启导

《学记》云:“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是说教师只有“善教”,即采用适当的教学原则和方法,才能真正达到使学生“继其志”的动机和效果。《孟子集注》曰:“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正是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而将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实现既定的教学目标。而“教亦多术矣,运用在乎人”。作为富有教学经验(当过小学、中学、大学教师、研究生导师及多校兼职教授)和教学管理实践经验(当过小学校长、中学教务主任、大学教务处长和副校长及多个社团任职)的潘懋元教授,十分注重教学原则与方法的综合运用与不断革新,尤其十分重视通过启发诱导而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造性。在长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潘先生逐步摸索、总结和创造了一套较成熟、效果好、易操作的教学方法。其高足张宝昆后来进行了系统整理,并名之曰“潘懋元大学教学法”。该法主要由“三阶段、九环节”构成:“第一阶段:(1)研究任务,了解学生。(2)精讲核心知识。(3)学生自学教材。(4)自选研究课题,学生独立钻研”。“第二阶段:(5)学生独立探索,教师给予必要帮助。(6)完成论文、研究报告、写讲义等任务后,师生共同讨论”。“第三阶段:(7)举行专题报告,学生自行主讲。(8)听讲者任意提问,参与者热烈讨论。(9)教师评价和小结讨论”^⑩。据我的观察和体会,潘先生的教学方式方法也可概述为:(1)讲座式教学(报告、座谈等);(2)讨论式教学(课堂讨论、“沙龙”讨论、“对话”讨论等);(3)研究式教学(让学生撰写论文、专题发言、参与课题等);(4)问题式教学(列问题、出选题、个别指导等);(5)导读式教学(指定参考书、检查读书笔记、让学生交读书报告等);(6)互动式教学(师生互动、学生互动);(7)开放式教学(让学生走出去、把专家请进来);(8)综合式教学(课内外一体、术业品并重)。

(五)高超的口才,严密的逻辑

我们说,歌唱家需要有一副清脆的歌喉,画家需要有一双敏锐的眼睛,教师则需要有良好的

口才。荀子说过：“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⑩。是说教师除了具有渊博的学识外，还要具备四个条件：(1)要有尊严的威信；(2)要有丰富的阅历和崇高的信仰；(3)要有良好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4)要能钻研和精通教材。《学记》一开始就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而杏坛执教达50余载的儒学大师朱熹则明确指出：“学不可不讲”，“讲学须能致思”。教师只有讲并且讲好，才能够梳理脉络，挖掘潜语；才能够使学生静听寻脉，思路拓展。潘先生特别强调学生要注意在平时有意识地锻炼自己的口头语言表达能力，谈话或报告时要善抓要害、逻辑严谨，切忌含糊其辞、语无伦次；要语言简炼、通俗易懂，切忌繁言赘语、佶屈聱牙；要言之成理、持之有故；要深入浅出、表述生动；要语速适宜、音量适中，等等。凡听过潘先生讲课或报告的人，无不对他那年轻人犹感不及的敏捷才思、严密逻辑、流畅表达和记忆力而惊叹不已。他“理论”起来常常脱离讲稿，面带微笑，娓娓道来；思路清晰，层层递进；鞭辟入理，切中要害；抑扬顿挫，铿锵有力；论点新颖，论据充分。听者确实是一种美的享受。我多次身临其境、亲耳聆听，每次总感到心海荡漾、思潮涌动，收获颇丰。孔子曾感悟其人生乃“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我们的潘先生不也正是如此吗？！

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傅任敢先生在称颂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时曾说过：“在现今世界，服务有几个信条：(1)要肯于做事；(2)要忠于所做的事；(3)要久于所做的事；(4)要专于所做的事。梅先生可谓具备了这四个条件，这事太不平凡”^⑪。可以说，潘先生也同样具备了这四个条件。他十有五而“志于教”，此后一直专心致“志”，不懈追求。正因如此，才使他达到了“五高”的境界，迎来了事业的辉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潘先生20年前创榛辟莽的开拓和20年来矢志不渝的建设，就没有中国高等教育学科的今天。“第一”的意义不只在第一本身，而在于有了“一”之后的继续建设与发展。潘先生集开拓与建设于一身，确实难能可贵。而这，全赖他首先造就了一个高境

界的自我。《孟子·尽心下》云：“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潘先生的“善、信、美、大”，历来为学人所敬仰。要言之，潘懋元教授尚德、求真、创业、育人的综合素养可描述为：

(一)三“识”：渊博的知识；高远的见识；争先的胆识。

(二)六“师”：师德高；师志坚；师学勤；师业精；师风正；师表端。

(三)八“度”：思想境界有高度；言传身教有信度；专业造诣有深度；文化知识有广度；科学研究有精度；从严治教有法度；仪表端庄有气度；争先创新有力度。

(四)十“开”：开通的思想；开拓的精神；开动的脑筋；开阔的眼界；开朗的性格；开诚的态度；开导的方法；开启的学风；开放的步伐；开创的局面。

(五)《学记》云：“亲其师，信其道”。最后，还是让我借用《诗经·小雅》和《论语·子罕》的两句话作为弟子们对潘师的内心感受吧：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仰之弥高，钻之弥坚”。

注：

①④⑥⑦⑧《潘懋元高等教育文集》，新华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751、767、765、432页，第245~246页。

②方耀林：潘懋元——踏遍青山人未老，《师范群英，光耀中华》第5卷，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年6月版。

③郭世一：为学之道——访教育家潘懋元教授，厦门大学《图书馆通讯》第3期，1990年1月。

⑤潘懋元：选才、培养、指导——我对博士生培养的一些看法和做法，《研究生教育理论与实践》，1989年第3期。

⑨潘懋元：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必须更好地为实践服务，《高等教育研究》，1997年第4期。

⑩张宝昆：培养优秀专业人才的方法——潘懋元大学教学法，《英才培养法》，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版。

⑪《荀子·致仕》。

⑫傅任敢：值得我们学习，《重庆清华》第22期，1949年1月8日。 [本文责编 任元军]